
新会县文史工作25年

• 何卓坚 •

(一)

新会县政协遵照周恩来总理号召，老年人士把自己丰富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县政协四届会议决定，于1962年底，在政协委员中，觅色适当人士组成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政协副主席陈国伦兼任主任委员，副主席施见三兼任副主任委员，常委李钦、何卓坚等兼任委员。机构成立后，即开展工作。具体由县修志会干部容忍之、李朝汉等兼任。他们首先制订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办法八条，征集文史资料参考题目44条。其中属于我县历史事件的18条、经济方面16条、文化教育方面7条、人物方面3条，给撰稿或回忆者参考。

工作办法和征集题目订出后，便积极广泛推动我县中老年人士，要求他们本其见闻所得如实撰写。并强调“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求完整”；“贵具体不贵议论，贵翔实不贵粉饰”。年限以辛亥革命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稿子征到后，挑选比较重要的史料，编成《新会文史资料选

辑》，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出版三辑，只作不定期的内部刊物。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之前，县政协为了做好统战工作，举办社会人士学习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参加学习的有莫荣坊、邝均怡、何修文、李子韶、谭崇清、蔡锡五、许仲桃、谭迪壮、龙元亨等，他们在修志会干部容忍之等同志的推动下，认清形势，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愿意为祖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时值政协开展文史工作，因他们社会阅历丰富，故鼓励他们写回忆录。一经发动，他们就乐意撰写。“文革”前出版的三辑，以及留下备用的稿件，不少是他们撰写的。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8月，县政协恢复活动。1980年冬，谢悦秘书长知我原是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之一，为了恢复我县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约我觅色人。当时我推荐李达生、伦海滨、赵拱卿、刘又生、黎安之等几位，因为他们多是曾担任报刊工作，社会阅历丰富。谢秘书长接受我的意见，便召集我们多次开会研究恢复文史工作问题。

1981年2月底，县政协召开六届一次委员会议，何卓坚、李达生、赵拱卿、伦海滨、刘又生都是政协六届委员。县政协成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专业小组。由政协委员自愿报名参加，我和李锦波、何达云、李达生、李朝汉、伦海滨、赵拱卿、刘又生、龙庆锵、卢文博、陈洪有等均报名参加。按规定，各工作组的正副组长，一般是常委兼任，我于是被选为文史工作组组长，李锦波、何达云被选为副组长。组员除上述报名参加的政协委员之外，还邀请黎安之、伍

辉、伍学煌、何坤巽等四位社会人士参加。

经受“文化大革命”的创痛教训，不少人心有余悸，发动社会人士撰写稿件，是不容易的。经文史工作组研究，分批邀请爱国社会人士多次参加会议或上门拜访，或个别串连，将心引心，建立感情，然后鼓励他们撰写稿件。在八十高龄的原国民党新会县党部秘书林瑞尧老先生带动下，李淞甫、赵绍法等积极口述或撰写史料，逐步扩大，队伍形成以后，成立会城文史资料研究小组。

1984年6月，县政协换届改选，贯彻上级政协指示精神，进行新老合作交替，文史工作组的何达云、龙庆锵、刘又生、卢文博、陈洪有和我，因年老关系，没有继续被邀请为政协七届委员。

县政协七届一次委员会议，决定文史工作组组长为李锦波，副组长为李达生、陈占标。组员有李朝汉、伦海滨、赵拱卿。敬聘容忍之、何卓坚、谢悦、何达云为顾问。并成立会城、古井、沙堆三个文史资料研究小组，以政协委员为骨干，联系组织该地热心文史工作的人士开展工作。会城小组组长为陈雄杰，副组长为李达生（兼）、何坤巽。古井小组组长邓信和、副组长梁华金。沙堆小组组长徐耀忠、副组长林达天。

1987年5月，县政协八届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我县实际情况，成立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撤销文史工作组。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主 任：李 平

副主任：谭仲川 甘 犁 陈如松

委 员：伦海滨 李朝汉 陈占标 吕天祥 罗复生

顾 问：容忍之 何卓坚 谢 悦 李锦波 李达生

曾国棠

文史科科长：张 法

委员会下，按地区增加大泽、司前、荷塘三个文史资料研究小组。大泽小组长吕天祥，司前小组长汤狄龙，荷塘小组长刘育强。本届会城小组长李达生、何坤巽，古井小组长为吴天保，沙堆小组长为徐耀忠、林达天。

(二)

1963年1月，《新会文史资料选辑》出版后，除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外，至1988年8月，共出版30辑。其中1至3辑为誊写油印16开本，4至5辑为打字油印16开本。从第6辑起，改为铅印32开本。印刷数量，从开始每辑油印200册，发展至铅印1200册。从内部发行转到公开发行（从第6辑起）。

在30辑《新会文史资料选辑》中，有由民建支部、工商联供稿的《工商经济史料专辑》。另外《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和《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各两辑。共选登文史资料324篇（其中属政治方面5篇、司法方面2篇、医药卫生方面4篇、军事方面49篇、经济交通方面41篇、文化教育方面54篇、华侨方面11篇、宗教方面3篇、人物方面50篇、社会生活方面56篇），另图片6面。参加撰写的有151人，单位11个。

新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后，在所征集到的文史资料中，上送全国政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先后在

全国政协《辛亥革命史料选集》第7辑出版的有李朝彦《广州起义(黄花冈之役)广东新军不能响应的内因》。在《广东文史资料》出版的,计有何卓坚撰写的《新会葵业史略》(载64年15辑)、陈国伦撰写的《民初邓铿在海口惩办“猪仔”贩子的经过》(载65年19辑)、何卓坚撰写的《解放前的新会 陈皮业》(载65年20辑)、关协晃撰写的《解放前新会葵业的经营概况》(载80年28辑)、何坤巽撰写的《回忆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日文日语训练班与鹿地亘》(载86年48辑)、何卓坚撰写的《新会当押业》(载88年56辑)、许朝燕、张厚撰写的《会城酱园业与大有亚佗霉姜》(载88年56辑)、何卓坚撰写的《冈州植牧股份有限公司》(载88年56辑)。此外,由民建广东省委员会、省工商联收集我县有关史料编入《广东工商史料辑录》的14篇:计有伦海滨的《广东近代硬币史略》、《广东纸币史略》,何卓坚的《新会当押业简史》、《冈州植牧股份有限公司的始末》、《解放前的新会陈皮业》,黄发、张厚、许基的《会城谷米行和碾米业的盛衰》,赵拱卿的《抗日战争新会城沦陷时期的米价》,关协晃的《解放前新会葵业的经营概况》,林强的《荣获伦敦展览会金质奖章的新会竹壳画织扇》,许朝燕、张厚的《会城酱园与大有亚佗霉姜》,余球、黄华、张厚写的《会城酒楼茶室业的变迁》,林达天的《江门沦陷后的古井》,黄伦的《新宁铁路跨海路线为何舍近求远》,刘伯臬、谭迪壮、何坤巽的《新宁铁路兴建时在新会遇到的地方封建势力的困扰及其它》。还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印的《新闻研究资料》载有伦海滨的《抗战胜利后的〈民权报〉》(第29辑)和钟华的《〈新会战报〉的始终》(第25辑)。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从第6辑起，公开发行，已如上述。各界人士和单位索购日多，本会旨在向社会宣传教育，每册只收工本费数角，许多农村、学校都踊跃订购。尤以近年我县着手编写《新会县志》，不少编纂单位纷纷索阅，找寻资料，他们都认为《新会文史资料选辑》对编志工作帮助很大。许多读者也认为这是过去家乡的重大事情，不可不看。前年秋，一位美籍华人、博士、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萧凤霞女士，多次回到景堂图书馆参考《新会文史资料选辑》，还多次在景堂图书馆约见我。有一次，她陪同一位美国史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ARTHUR WOLF先生，再次约见我，说他们多次看到我写的文史资料，并赞扬我们化费了很大力气，写成这么多的地方史料，还认为我们写得深入细致，使他们获得许多知识。

1982年底，省政协召开全省文史工作会议，我县由谢悦秘书长出席。会上，我县文史工作受到表扬。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之所以受到称誉，主要是有党的指引，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工作人员的配合。但不足之处尚多，表现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最初所制订的参考题目所列举的征集范围还没全部完成，有些史料的内容还不够深入细致或未臻翔实。凡此种种，有待今后完善、改进。

（上接第15页）器工会也响应和支持，发出全县汽车司机罢工抗议的通知。整个汽车行业的工人都纷纷起来罢工，连县长张寿的专用小汽车司机黄松也执行工会纪律而罢工，使全县汽车交通陷于瘫痪状态。这次罢工斗争是抗战后江会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轰动了全省。1949年3月4日，新会葵扇工人要求加薪七成，遭资方拒绝后，也举行罢工。

关于新会工人运动

（一）1927年前的艰苦斗争

梁光中

卅年前，我访问了新会葵厂老工人邓戊，他向我谈了在1927年前共产党领导新会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故事。这位慈祥的老人讲得很动听，他笑着说，这些事都是在你们还未有出世时发生的。

下面是他讲述的几件事：

最初的工会

新会县最初的工会是在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之后才成立的。当时由广州派来了两个同志（一个姓陈、一个姓邓，都是共产党员）到新会发动工人组织工会。我还记得成立工会时是在会城黄家楼西墩尾关帝庙门口，宣誓是由陈同志主持的。当时用的是一面红色有镰刀斧头的党旗，一面是葵业工会的会旗，旗上有一把葵扇，工会的证章也有一把葵扇，中间有一个“工”字（我当时也做葵业工会的候补委员），总工会设在刘家祠，工会里除了挂孙中山像外，还挂马克思像。有了工会，工人就有党的直接领导。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家！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并捐钱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

罢工斗争

在总工会领导下，当时油业、米业、药材、车衣、理发等行业都成立了工会。

罢工斗争以葵业工人为最活跃，老板经常扣减工资，我们的生活没法维持，便要求提高工资，夹葵要由五分四钱一扎提高到六分半钱，老板不答应，工人便罢工，一直坚持了半年多。在罢工期间，工人生活困难，宁愿去捉鱼虾、斩柴割草渡活，也坚持斗争。江门市的铁路、海员和烟丝工会也捐款支持我们的罢工斗争。最后老板不得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胜利了，队伍也扩大了，加入葵业工会的人也由500多增加到800多人。

工人纠察队

工会成立不久，就组织了1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当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每人都戴一顶竹帽，佩一把五寸多长的剑，我们当时实行了抵制日货，见有日货就缉，在江门就缉了两船煤。

工人纠察队也去发动工人参加工会；这就常常和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商团”发生冲突（当时的商团董事长是陆卓南），有一次，我们到西墩尾去发动工人加入工会，被商团军埋伏打我们，当时打伤了三人，捉了三人，我们就跟着他们去，到浚湾街时，他们说：“你们再来就开枪。”我们说：“你们捉工人没有道理，开枪我们也不怕死。”于是一直跟到县府去和他们讲理。以后，被捕工人释放了，被打重伤的工人汪相半个月后就牺牲了。

示威巡行

我们组织了工会，资本家和工贼也组织了所谓“代表

会”与我们对抗，就常常发生冲突。1924年的“五一”劳动节时，我们在“闾邑书院”（即现在一中）开完大会之后，就进行示威巡行。行到宜民桥时便与“代表会”的人打起来，一直打到大新街古巷口，我们的骨气很硬，一个人要敌他们很多个，我自己也受了重伤。

“共产党会回来的”

到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进行了“四·一二”大屠杀；又在广东进行了“四·一五”的惨杀，我们新会的革命斗争就更艰苦了。有一次，我们在北门开会（有工人和农民参加），会开到中途，就知道国民党军由江门来包围的消息，立即散了会，木朗村的农民在半路与国民党军遭遇了，打了一场。自此之后，由于国民党大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工人（在新会也牺牲了好几十人），葵业工会主席梁宇（党员）和常务委员司徒成都被囚于广州，后来牺牲了。领导我们的陈同志也离开了广东，他临走时对我们说：“共产党会回来的。”

当国民党在江门捉司徒成的时候，我与他们在街口碰上了，险些被捉（我先看见他们，他们未见我）。后来国民党通缉我，我就离开了会城，到朋友处躲避了两年。在国民党统治的日子里，我渡过无数艰苦的岁月，我两个儿子饿死了，两个女儿都卖给了别人。是的，正如陈同志所说：“共产党会回来的”。解放后，我开始过着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不会忘记，这美好的生活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得来的。

（原载1957年7月1日《新会报》）

（二）大革命后的斗争

李景周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撤消或“改组”，所有工会都被黄色工会——广东总工会五邑办事处所控制。但仍然有不少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工会“改组派”作斗争，在革命的低潮中曾掀起一个小高潮。1927年10月18日，新会印刷分工会各支部发表宣言，揭露工贼压迫原工会执委罪恶活动，呼吁支持县总工会第二届执委恢复工作。12月初，中共新会县委响应广州起义，准备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五邑暴动指挥部，由叶季壮任总指挥。李安负责江会的工人武装暴动。以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为基础，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广东中路纵队新会总队。5日，当张发奎的薛岳部队从广州进入江会地区时，中共新会县委和新会总队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积极领导工农群众开展公开活动。恢复县总工会，驱逐各行业工会的改组委员，接收《四邑平报》和《江门民国日报》，召开工农会议，联名向薛岳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工会和农会的自由，承认“四·一五”前广东革命政府所公布的有关保障工农利益和工人与雇主所签的协议。15日，新会总队在会城北较场举行万人暴动誓师大会，李冠南在会上宣读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五项纲领。同时，在江门螃蟹山举行工农群众大会，有7000—8000人参加。中途，两个会场都受到了薛岳部队的破坏，大批军队用暴力驱散参加大会的工农群众。当晚，薛岳部队会合商团武装在江会地区实施戒严，原计划在晚上举行暴动，被迫取

消。在反动派的镇压下，县总工会再次被查封，被捕的工人群众达200多人，刚刚组建起来的革命武装随之夭折。

武装暴动失败至1928年7月间，我县工人运动陷于停顿状态，只有在6月由于宁阳铁路整治委员会召人投承挑担行李工作，承办人包揽北街车站码头一切运行行李的权利，致使原有的搬运工人失业。中共江门市委于6月26日组织北街搬运工人100余人反抗，手持小旗标语前往江门市政府请愿。因此，中共广东省委于7月5日指示江门市委要在广大工人中加强宣传，将全总所发各种宣言尽量翻印散发给工人，要结合工人本身利益，宣传当地工农的经济口号，并发动葵业工人、宁阳铁路工人、轮渡工人，普遍建立赤色工会，恢复海员工会；扩大反帝运动，组织“雪耻会”，检查仇货，恢复民主。月底，中共广东省委在召开扩大会议后，省委又对新会的职工运动作了指示，明确指出新会要以宁阳铁路、海员、建筑、葵业、烟业工人为中心。但这期间及往后的几年，白色恐怖一直笼罩新会，县委转入地下，并几度遭受破坏，工作难于正常开展，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也就一直处于低潮。但各工会组织和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主要是经济斗争）时有发生。1929年6月底，新宁铁路工人因反对《劳资暂行通则》及《铁路员工服务条例》，并抗议路局无故开除工人而举行罢工，坚持10天，于7月3日铁路当局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三项复工要求：①路局不得无故开除工人，②罢工期间薪金照支，③不得雇用新人。工人斗争获得胜利，恢复通车。9月6日，冈州马路汽车公司的司机工人，要求恢复原有工资，资方没有答复，全体工友决定罢工，并通过广东机器总工会江门支会发出的《告各界书》。

同月21日，会城晒葵工人也为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扇寮老板被迫答应增加工人水衫费，全年共增加工银1400多元。1931年8月，江门榨油工会要求资方加薪而举行罢工，但被县府镇压。

“九·一八”事变后，江会各界纷纷掀起抗日高潮。新宁铁路总工会也在江门召开了抗日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新宁铁路总工会抗日会、宣传队，发动工人拒运日本货。1933年，新会葵业因受东北战事的影响，葵扇销路锐减，资本家乘机压低工人工资百分之二十五，全业工人于年底起来罢工，坚持了四个月。但由于资本家的破坏，罢工斗争最后还是失败。1934年1月冈州马路汽车公司、利达汽车公司、江门电话局、新光、普照两电灯局，广利丰米机等因资方解雇机器工人，而引起劳资纠纷。经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召集有关单位和工会的代表开会协商。于19日先行调处汽车公司的纠纷，决定由资方补回被解雇工人薪金一个月，另赠川资23天，其余继续调处。1935年3月上旬，江门恒益油榨店工人以及杉杂行、烟丝行工人为反抗资方削减工资，先后举行请愿和罢工，到6月资方同意维持原工资后，工人才复工。7月，江门恒益、怡信两榨油店工人因资方无故开除工人而宣告罢工，并在罢工前把所有渣浸在槽内（两天不起榨，便开始霉烂），迫使资方请求全体工人复工，工人便以允许被开除的恒益七班（每班十人）工人、怡信五班工人复工外，还补回被开除期间的伙食费为复工条件，资方只得答应，工人斗争获得胜利。1936年3月3日，酒楼茶室、旅业、米糠、理发、航员、印务和机器等六个行业工会绝大部分成员开展反对工贼把持会务的斗争，在江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

组织联合办事处，出版周刊，争取社会各界同情和支持，取得了胜利。

1937年3月10日，会城葵扇剪、焙工人800余人举行罢工，发表《告全体工友书》，要求恢复1931年以前的工价，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经过一个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共新会县党组织及党员活跃起来，在工人中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组织工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底，共产党员陈孔嘉、王文纯以在江门镇公所任职的公开身份，经常到广东机器工会江门办事处活动，搞工运工作。通过举办工人骨干学习班，组织工人学习进步书籍，研究时事，分析抗日形势，团结了一批工人。后来还在机器工会中成立了一个工人骨干读书会，经常参加学习的有陈昶、郭咏梅、陈家志、招冠、许煊（电厂工人）、何长业、高怡亭（机器工会）、朱国华（电影院大偈）、苏洪基（冈州马路汽车工人）、胡益金（江门北街公路汽车工人）、游全（新宁铁路工人）、李生（米机工人）等十几人。1938年初，陈孔嘉、王文纯和机器工会一些负责人，组织领导机器工人属下的工人40多人，成立江门机器工会工人锄奸队，对付汉奸卖国贼的破坏。同时，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新会县队部”成立不久，江门也成立了“新会县青年抗日先锋队江门工人分队”，成员以青年店员、手工业工人、机器工人为主，江门电力厂工人招冠、许煊，店员李文等均是抗先骨干。工人分队活动比较活跃，由陈家志负责。

1939年春，日本军队进犯我县，江门、会城相继沦陷，大部分工人失业，各工会组织也逐步解体，至抗战结束

的一段时间，我县的工人运动陷于停顿状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新会县党部为了推行防共的反动措施，于1946年恢复工会等群众团体。三年间，机器、民船、运输、酒楼茶室、旅业、米业、鲜鱼、单车、鞋业、邮务、葵扇、汽车站售票等行业工会相继成立，其中以机器工会人数最多、影响最大，这些工会组织都要由国民党县党部通过“政治会议”批准，并交由县政府立案后才能成立。县总工会也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47年通过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并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李梗为县总工会理事长，何长志、李汝当、陈佛天（这三人均为国民党员）等为理事。会址设在江门。

在国民党政府危在旦夕之际，国民党反动派和工贼经常到工会组织中活动，以加强对工会的控制，使工会成为防共反共和压制工人斗争的工具，为挽救蒋家王朝卖力。1948年底，江门造纸厂工人为改善待遇而举行罢工，该厂总经理余读中等人以“每月乐助总会（指广东省机器工会）实谷五十斤”的代价，收买了该会及其新会支部的负责人，他们派工贼到工人中进行名曰“调查”，实为恐吓活动，破坏工人的斗争。广东机器工会主任委员李德轩也曾在事后写信给该工会，嘲讽和恐吓工人的斗争。1949年9月，国民党省政府组织“劳工访问团”到我县访问劳工和动员民众，其目的是：①“使各地工人不受‘共匪’欺骗”；②“宣传广东工人起来保卫家国，争自由，争生存”；③“使工人明白国际有分极权与民主两大阵地，将来必能战胜；”④“要使各地政府切实了解到工农为国家基础。”访问团在访问期间，极力向工人宣扬“不怕共，不信共，不附共，不容共”的反动政

策，要工人“扭转局势”。江会解放前夕，广东机器工会派王进到江门，通过何长志等人搞阻止解放军南下解放江门会城的破坏活动。他们在江门娱乐戏院召开以机器工人为主的工人大会，宣告成立“广东机器工人子弟10万大军爆破大同盟”。由于解放军很快就解放了江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这个“大同盟”就瓦解了。

1947年开始至江会解放为止，中共新会县委积极深入到各工会中开展活动，派曾国棠在江门（以机器工会为主）、李光中在会城（以葵扇工会为主）搞工运工作。曾国棠等人经常以东兴机械厂和机器工会子弟学校为据点，做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调查了解工人的斗争情况，加强与各工会的联系，为迎接江会地区解放创造有利条件。到解放前夕，通过我党的积极活动，能控制的工会有邮务工会、江会汽车工会等，当时凡是我党打电话都是畅通无阻的，汽车也都可以随时取用。冈州马路工人还按地下党的指示，积极起来保护车辆物资，防止国民党残军掠取抢走，迎接江会解放。

恢复工会组织的三年间，工人的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也屡有发生。1946年2月11日，会城葵扇工人要求加薪，与资方发生纠纷。工人们经过一年的不断斗争，终于1947年2月获得解决。1947年3月13日，江会米机工人联请机器工会新会支会，要求各米机资方加薪但没有结果，是日决定集体辞职。7月间，会城晒葵工人也为加薪问题举行过罢工斗争。1948年下半年的一天，江门北街线的售票人被当地驻军搭霸王车的士兵殴打受伤，售票业工会马上报告政府要求查办解决，同时，发出全县售票工人罢工抗议的通知。机

（下转第6页）

1938年新会抗日救亡运动

曾 国 棠

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广州学生迅速响应，掀起了“12·12”运动。1936年1月9日，广州学生冲破重重封锁，召开全市学生抗日大会，成立广州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新会学生闻风而动，新会一中和新会师范进步学生组织了秘密的“大家读书会”，并联合举行抗日示威游行。6月广州“中国青年同盟”（中共外围组织）派盟员（不久转党）陈翔南、黄文康先后到新会的江门进行活动。10月成立了中共江会小组。1937年春，组成了中共重建新会党组织的第一个党支部。支书陈翔南，支委黄文康、黄志明、黄玉卿（女））。从此，新会人民继1929年大革命失败后，重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

9月，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中共新会党支部以“新会流动剧团”名义，组织“庆祝平型关大捷”活动，以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和影响。这时，新会一批爱国青年如阮克鲁、陈华钜、李鸣（李月娟）、容宗英、陈灿等，在

抗日救国热潮鼓舞下，到延安去学习。

8月初，国民党根据省的指示，成立了以国民党新会县党部特派员李淞甫、新会县长李务兹、民众代表李展鹏和各界头头为委员的“新会县各界民众御侮救亡会”。12月新会国民党党政机关和文化界组成“新会县自卫运动宣传队”。这些国民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多是空架子。中共新会支部派党员和团结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参加，并成为骨干力量。

当时新会县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迎来了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1938年。

1938年春，在新会十五区（大泽）园岗小学，成立中共新会区工委，陈翔南为书记，秦一飞、黄文纯、黄志明、谢燕为委员。

中共新会区工委委员黄文纯，是1937年底从台山新宁铁路工人子弟学校调来江门镇公所工作的。组织派他和党员陈孔嘉以江门机器工会为重点，开展工运工作。1938年初办了工人骨干读书班，成立江门机器工人锄奸队，在工人运动中，吸收陈家志、招冠等一批工人骨干分子入党。

1938年初，根据国民党省方的指示，“新会县各界民众御侮救亡会”易名为“新会县民众抗敌后援会”。国民党新会县党部特派员李淞甫仍兼任该会主任，聘陈孔嘉为后援会秘书，并担任该会机关刊物《抗战周刊》的主编，于2月份创刊。不久又经江门镇长吕伯朝要求，陈孔嘉到江门镇负责开展镇的抗日救亡工作，组织了“怒吼剧社”和江门镇大刀队，扩大镇壮丁大队。

寒假期间，“新会留省同学青青社”改名为“青青抗日救亡工作团”仍简称青青社，打破留省同学界限，吸收社会